

世紀·中文大學：我所理解的新亞精神

文章日期：2009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天十月十日，新亞書院建校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從桂林街發萌的獨立文人辦學精神，至六十年代被收納進西式大學（即中文大學）與公帑建制以後，各界感慨新亞精神消殞之聲從未間斷。適逢中大前校長高錕獲得諾貝爾獎，這校園新舊人事重又成焦點：新亞教學理想，在今天還能是一樁怎樣的寓言？此文作者將娓娓道來，向新亞精神遙遙致意。

今年，二〇〇九年，是母校新亞書院建校一甲子。校慶日漸近，我不知應該如何紀念這個日子，於是選擇重讀錢穆先生的《新亞遺鐸》和《師友雜憶》兩書。這兩本書，我讀過多次。這番重讀，本意是以這樣的方式，向錢先生致敬，沒料到卻讀出一點感受和感懷。

讀兩本書 紀念這個日子

新亞人喜歡談精神。這在香港很少見。大學精神必然是理想性的，背後承載高遠的價值和理念，並以此為方向，將學生從某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成為有教養有判斷力有承擔的知識人。大學精神同時是實踐性的，必須能夠充分體現於教育每個環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感染，並樂於在生活中追求這些價值。

那麼，什麼是新亞精神？肯定不是「手空空無一物」的捱窮精神，也不只是「艱苦我奮進」的吃苦精神，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理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亞學規第一條和第二條呈現的教育理想。學規第一條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說：「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這兩條學規，看似老生常談，卻是整個新亞教育的靈魂。學規其餘二十二條，都是對這個理念的發揮和引伸。錢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向中大辭職後，在最後一次新亞畢業禮演講中，特別再一次提醒學生：「我在新亞十五年，時時教諸位應知『為學』、『做人』並重，這決不是隨便說。我此番之辭職，在我是處處把做人道理來作決定。」

這兩條學規，說白了，就是要將學問與人生打成一片。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幫學生謀職業謀資歷，不是在同儕中爭排名爭資源，更不是將學生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是透過悉心教導將學生培育成人。成爲什麼樣的人呢？學規第三條馬上說：「愛家庭、愛師友、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爲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爲求學做人之目標。」這即表示，新亞教育認爲人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活在歷史傳統文化社群當中。個體只有在種種人倫關係的實現中，在學問與事業的追求中，在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中，人才能夠完成自己的人格，才談得上活得幸福活得有價值。新亞將個人德性的培養，放在教育的中心。新亞辦學的旨趣，不是專科教育，不是技術教育，更不是一味迎合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商品教育。早在六十年前，新亞前人在那樣艱苦困頓的環境中，已明白宣稱「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爲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爲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那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依我理解，錢先生認爲主要有三方面。一，書院必須推行通才教育，使學生先成爲一通人，再求成爲一專家。只有這樣，學生才能認識到專科所學在整個學術和整個人生的地位和意義。二，書院必須要有一群敬業樂業的老師，與學生共同生活，言傳身教，知性與德性並重，培養學生成爲完整的知識人和具社會關懷的公民。三，書院必須營造優良的學風和校風，使學生的創造力、審美力、審慎思考和道德實踐能力得到充分發展。

余生也晚

新亞曾經在哪個時期，實現過這理想？余生也晚，未曾親歷。我只知道，我在九十年代入讀新亞時，這個對書院教育的美好想像，早已式微。據說，轉捩點是一九七六年大學改制，校方將書院權力盡收中央，以致新亞九位校董集體辭職，並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不能實現」。作爲後人，我沒法判斷當年的是非，現實卻是當書院沒有自己的課程，沒有自己的老師後，當初所期望的上承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的理想，也就失去實現的可能。書院剩下的功能，是爲學生提供宿舍和籌辦一些非形式教育。這和桂林街及農圃道時代的新亞，已是兩個模樣。我們這一代，聽起老新亞談起昔日種種，感覺久遠而陌生。那不是屬於我們的歷史。我們只能在舊相片和故紙堆中，努力想像當年新亞的氣象。

這十多年來，我幾乎沒有聽人談過什麼新亞精神。即使偶爾有人說起，也是輕飄飄無所着力，甚或帶點嘲弄。新亞精神？不就是手空空無一物，窮得只剩一首校歌嗎？！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在大學中談大學理念已成滑稽之事。因爲我們不再相信，大學還有理念這東西。但是，新亞人啊，如果你有機會讀讀錢先生的

《新亞遺鐸》，有機會吟誦一下二十四條新亞學規，我相信你依然會感動，依然會嚮往。裏面的觀點，或許你不盡同意，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今天的大學無從得見的境界。有時打圓形廣場走過，我會特意停下來，逐年逐年細數刻在金屬板上那些新亞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沒有新亞，如果沒有新亞精神孕育出來的新亞人，香港過去六十年的教育史文化史學術史一定會改寫。

我一直認為，如果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新亞的教育理想不能再由新亞獨自去完成，那不表示這些理想已經過時。如果這些理想值得追求，那麼中文大學理應將其承繼，並好好發揚光大。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提倡的難道不同樣是以人為本，以學生德性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嗎？現實當然不那麼理想。我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解釋今天的大學為什麼愈來愈走向專門化技術化商品化，以及為什麼愈來愈難培養出有批判力有個性有社會關懷的學生。我們有太多的解釋，說明事情為何不得不如此，然後置身事外。但作為中大教師，有時我不得不捫心自問，我們這些為人師表者，還有多少仍然在乎這些教育理念？即使有心者，在關起門來趕論文寫報告和應付這樣那樣的評核後，又能剩下多少時間心力和學生溝通相處？身在其中，觸目荒涼。所以，我常想，不知到哪一天，大學才可以創造一個寬鬆自由一點的環境，讓我們安心盡一個老師應盡的責任，享受到教學的滿足和成就，並真能為香港和中國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平情而論，這樣的要求合理不過，但在現實中卻又如此遙不可及，說來不無心酸。

香港的大學：請擺脫困獸鬥

當然，有人會說，新亞那一套，早已過時。事實上不是。金融海嘯的衝擊，告訴我們，一群貪婪無度不分對錯的所謂知識精英，可以將整個經濟體系弄垮，並要無數人受苦。沒有道德約束的個人和制度，會為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香港今天的普選爭議，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再不努力培養出對社會有關懷，對價值有堅持，對政治有投入的公民，香港不可能在可見的將來成為自由公正的民主社會。而全球資本主義導致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文化危機和嚴重的社會不公，更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在價值中立的幌子下，只懂繼續大量生產欠缺判斷力和盲目維持既有建制的下一代，人類文明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香港的大學，如果看不到時代的挑戰，仍然汲汲於困獸之鬥，將會欠下無可償還的歷史債務。

新亞精神，不限於新亞，甚至不限於中大。六十年時光，滄海可以成桑田，少年必已變白頭。新亞精神，卻歷久彌新，值得我們好好珍重。

周保松--九五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文·周保松 圖·自《新亞遺鐸》 編輯：黃靜]